



中外文化与文论

CSSCI来源集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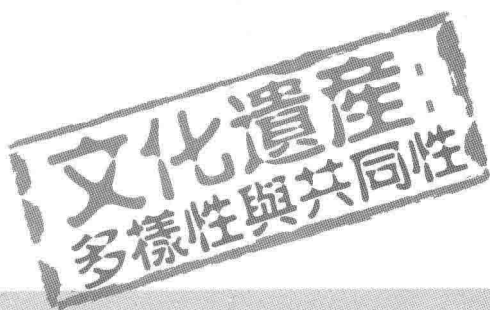
中外文化与文论 Cultural Studies and Literary Theory

第28辑

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
四川大学中文系
汉语言文学研究所
主办



四川大学出版社



中外文化与文论
Cultural Studies and
Literary Theory

第 28 辑

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
四川大学中文系
汉语言文学研究所
主办



四川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黄蕴婷
责任校对:欧风偃
封面设计:原谋设计工作室
责任印制:王 炜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外文化与文论. 28 / 曹顺庆主编.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5. 4
ISBN 978-7-5614-8503-3

I. ①中… II. ①曹… III. ①文化—研究—世界—文集
②文学理论—文集 IV. ①G112-53②I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82186 号

书名 中外文化与文论(28)
ZHONGWAI WENHUA YU WENLUN(28)

主 编	曹顺庆
出 版	四川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24 号 (610065)
发 行	四川大学出版社
书 号	ISBN 978-7-5614-8503-3
印 刷	郫县犀浦印刷厂
成品尺寸	165 mm×240 mm
印 张	13.5
字 数	251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6.00 元

◆读者邮购本书,请与本社发行科联系。

电话:(028)85408408/(028)85401670/
(028)85408023 邮政编码:610065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
寄回出版社调换。

◆网址:<http://www.scup.cn>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 录

民族文化遗产：多样性与共同性

1	论中国多民族文化认同	曹顺庆 秦 岭
7	现代中国的多元历史	
	——从辛亥百年看多民族共同体的文化兼容	徐新建
18	大一统与多元一体	
	——中国文化的密码	曹漪那
28	《十七条协议》法律价值研究	周宝峰
39	遗产与认同的关联研究	邱 硕
52	交流与共享：丝绸之路上的藏文化遗产	才 让
69	深入与推进：多民族文化遗产研究的新发展	田级会

民族符号学专栏

78	民族符号学的可能性与必要性	赵毅衡
80	原自系统论：一个值得引入民族符号学研究的概念	彭 佳
89	土家族摆手舞的流变	
	——仪式意动性特征管窥	朱 林
101	白马藏人的民俗遗产	
	——“池哥昼”仪式的考察分析	王 艳
111	玉器与信仰：红山文化研究概要	叶舒宪 祖晓伟
123	地景象征与国家认同	
	——“长江”国族化的“跨边界”之旅	付海鸿

文学与人类学

- 135 文化理论与文学研究：诗学与文学人类学
〔加拿大〕史蒂芬·萨坎尼
黄晚（译）、郑玮（校）
- 144 “男性的文艺时代”
——汉彝互文中彝族诗人吉狄马加等四例分析 张叹凤
- 159 人类学视域中的中国“新富”
——评庄思博的《焦虑的财富》 梁 昭 李明慧
- 172 从《甜蜜的悲哀》看萨林斯的人类学突破与学术关怀 杨 柳

跨文明研究

- 181 美国比较文学与文学比较的政治幽灵
〔美〕蓝 峰
- 194 近 30 年中国的石门坎研究 朱丽晓
- 205 行者无疆 述者有界
——略论美国《国家地理》的新疆表述 罗安平

民族文化遗产：多样性与共同性

论中国多民族文化认同*

曹顺庆 秦 岭

[摘要] 现当代中国,关于中国多民族文化认同的学术研究是我国文化发展战略的重要环节。当前,中国多民族文化认同还有不少误区,例如:“现当代的中国人不认同中国古代文化传统”、“‘海峡两岸’文化的相互不认同”、“汉族和少数民族文化的相互不认同”这“三大困境”给我们的学术研究与文化发展带来了诸如文化主体分离、民族文化偏见和地域文化偏见等诸多问题,原因是我们未能正视对文化认同问题的认识偏见。在现实的研究中必须以“多元文化一体”的态度,坚持中国多民族文化的认同,坚持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性,才能继承和发扬我国民族和国家的文化传统。

[关键词] 中华文化认同 多民族国家 多元一体

引言

在现当代的中国,中华文化遗产的研究得到了学界的高度重视,我们在民族学、中国文学史、中国文献典籍研究和中国多元文化研究等领域都在开展着卓有成效的研究工作。但是我们同时也要看到,中华多民族文化遗产的研究正在面临中华文化认同的困境,这种困境突出体现在三个方面,我们可以称之为“中华文化认同的三大困境”。这“三大困境”分别是:现当代的中国人不认同中国古代文化传统;“海峡两岸”文化的相互不认同;汉族和少数民族文化的相互不认同。“三大困境”困扰着当代中国的文化研究、文化建设及其他

* 本文受2012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英语世界中国文学的译介与研究”(12JZD016)支持。

各方面的建设,其负面影响不可忽视。“三大困境”及其出路的研究对中华多民族文化遗产的认同、提升文化凝聚力和全面正确地进行当代中华文化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下文分别从“三大困境”的现状、原因和影响来加以阐述。

一、现当代的中国人不认同中国古代文化传统

从表面看来,现代人很多看不懂传统文化的文本,不熟悉、不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但是这种情况并非是现当代的中国人不认同中国古代文化传统的症结所在,这个困境更多的是更深层面的问题。举例说明:在“哈佛大学—武汉大学现当代文学史书写高层论坛”上,我们认为“所有现当代中国文学史的教材和专著都没有写入现当代人创作的古文作品,包括古体诗词及其他文言文形式的作品”^①。学术界不同意在现当代中国文学史收录现当代人创作的古体诗词作品的人有三种理由,以下分别予以辨析:

首先,公众往往认为古体诗词等古文文体是“僵死”的东西,所以不予收录。然而事实是像鲁迅、郭沫若等大家和其他许多现当代的作家都有古体诗词和其他文言文形式的作品。其次,还有的人认为古文创作在现当代中国没有群众基础。其实这也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据统计,“中华诗词学会”有上万个团体会员与个人会员,而有关现当代的“中国新文学学会”2014年年会才有百余人参加^②,各省作协的现代文学作家人数也有限。从这个意义上讲,古文创作在现当代的中国的群众基础可能远比白话文的“现代”文学创作更广泛。最后,一种常见的看法是古文作品没有“现代性”,所以不该收录。现当代文学所追求的“现代性”,往往是与“民主”、“自由”、“思想解放”、“进步”等范畴相关的,这一点可以体现在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以来的现当代文学创作实践上。如果从这个角度出发,以纪念周恩来同志逝世进而反对“四人帮”的《天安门诗抄》这样的群众作品是具有“进步”、“思想解放”等“现代性”特征的。而《天安门诗抄》的作品中,70%以上都是古体诗词。^③综上所述,古文创作既没有“僵死”,又有群众基础和“现代性”,所以理应收录到现当代中国文学史中。进一步调查我们发现,有的人认为如

① 参考曹顺庆在该会议上的发言,2012年12月11日,中国武汉。

② 根据中华诗词学会官网“会员库”一栏的数据,及中国新文学学会第30届年会会议新闻整理。中华诗词学会官网是<http://www.zhscxh.com/>;关于中国新文学学会第30届年会的新闻地址是<http://www.yn1234.com/yule/bagua/20140820/13792.html>

③ 黎之:《回忆与思考——〈天安门诗抄〉出版前后》,《新文学史料》,2001年第2期。

果在现当代中国文学史中收录古体文学，可能会对现当代文学造成压迫。事实上，具有“压迫性”的，应该是“现代人不认同古代文化遗产”的既成现实与观念。现代人不仅不认同古代文学的内容，甚至于不认同古代文学的形式。对比西方当代文学发展来看，西方古代的文体，在西方当代一样地“活着”。这种不认同导致了我们现在的一系列文化问题。

二、海峡两岸文化的相互不认同

在台湾，部分“台独”人士在台湾的一些高校建立所谓的“台语系”^①，以“去中国化”的态度，居然把中文系和中文专业搞成了“外文系”、“外国语专业”。这种文化不认同所产生的政治现实，给中华民族的国家统一事业带来了严重的破坏与冲击。还有一个明显的例子是简体字和繁体字的问题。港澳台的部分普通人也认为，大陆地区使用简体字，所以“大陆文化”不能等同于繁体字所代表的中国文化。众所周知，繁体汉字的书写是学习中文的一大困难，而汉字简化方案也绝不是今天才有的。回顾中国历史，首次以国家（政府）行为推行简化字的是太平天国。当时洪秀全政府的印玺和印发的公告、书籍等，大量采用了民间流行的简化字，同时也创造了不少新的简化字。这些简体字大多数已被《简化字总表》采用^②。1920年2月1日，钱玄同在《新青年》上发表《减省汉字笔画的提议》一文，认为繁体汉字有诸多弊端；1922年，钱玄同等人进一步提出了8种简化汉字的策略，这是历史上第一次有人系统地提出汉字简化的方案；1934年1月，国民政府“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第29次常委会通过了钱玄同的《搜采固有而较适用的简体字案》，并上报“教育部”施行，后来在1935年8月21日，中华民国教育部发布第11400号部令，正式公布《第一批简体字表》，该文件采用了钱玄同所编纂的《简体字谱》中2400字中的324个，推行当时所称的“手头字”（也就是简化字），这是第一次以国家行为系统地推进简化汉字的方案。新中国成立以来，从1949年10月10日“中国文字改革协会”成立开始，以国家行为开展了一系列简化汉字的研究和推行简化汉字的措施。1956年1月31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国务院的《关于公布〈汉字简化方案〉的决议》和《汉字简化方

① 中国台湾中正大学、真理大学等学校先后设立过台语系、台文系等，但最后都以关闭告终。

② 《简化字总表》的最终版本是1986年修订版，共收2,274个简化字及14个简化偏旁：第一表收不可用作简化偏旁的简化字350个，第二表收可作简化偏旁用的简化字132个及14个简化偏旁，第三表收类推简化字753个，《附录》收习惯被看作简化字的规范汉字39个，其《说明》里有提到表外字“凡用第二表的简化字或简化偏旁作为偏旁的，一般应该同样简化”。

案》。1964年5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出版了《简化字总表》。自此,简化汉字在中国大陆取得了官方文字的地位,获得了国家的法律认可。汉字的简化固然对发展大众教育、普及文化知识有着不可磨灭的积极的历史意义,但是也带来了许多问题。首先,造成“海峡两岸”不同读者阅读文本和交流的困难。这种困难使得固守地域文化身份和族群文化身份变得更容易,人为地制造了交流与融合的困难。其次,中华文化的整体性产生了分离。古代文本和港澳台、海外华人文本多是以繁体字呈现,大陆地区的文本以简体字呈现,这种区别使得彼此潜意识里不信任对方的文化正统性。大陆地区是中华文化的地理之根,而传统文化又偏偏以漂洋过海或者沉淀在古籍里的繁体字为书写形式,双方都有自居正统的理由和质疑对方的说辞。而这种状况是人为造成的遗憾。关于汉字的书写形式其实还有更极端的争论,如有人曾提出要把中国字拼音化这样极端的主张。^①种种历史事实不一而足,不再赘述。

三、汉族和少数民族文化的相互不认同

今天的中国文学史,绝大部分没有少数民族文学史,实际上只是汉族文学史。这个问题带来了一系列从根本上是错误的论断。比如说《格萨尔王传》在宋代开始形成,在明、清两代开始成熟,当今却鲜有中国古代文学史提及它。另外比如《江格尔》与《玛纳斯》等少数民族的伟大作品也面临着同样的不被认同的问题。当然,我们也可喜地看到,近年来部分有识之士开始正视这个问题,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比如张炯等人所著的《中国文学通史》(12卷本)就有关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的内容。还比如潜明兹所著的《中国读本:中国少数民族英雄史诗》就有力地用实证材料证明了中国是有史诗的。汉族不认同少数民族文学,这是中国现当代知识分子的一大失误,本不应该发生。为什么这样说呢?以《二十四史》(或者《二十五史》)为例,作为中国古代官修正史的这些历史典籍,历来是中国多民族一体的“正统”历史和文化的重要证据。其中的《北史》、《魏书》、《辽史》、《金史》等,不仅是若干少数民族政权辽、金的历史,连编纂者元代的丞相脱脱,也是少数民族贵族知识分子。我们根本不可能否定少数民族历史是统一的中华民族历史的重

^① 谭嗣同首先在《仁学》中提出过这个问题;钱玄同、赵元任等人在1922年《国语月刊》“汉字改革号”上明确提出汉字拼音化问题;甚至鲁迅也在《论中国文字的新生》等文中提出改革汉字书写的问题。另外蔡元培、郭沫若等人均有论及。参见郑红梅、黄悦波:《试析中国汉字拼音化的内在原因》,《江西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徐时仪:《汉语拼音化和汉字改革的反思》,《语言文字周报》,2004年4月,1053~1062号。

要组成部分，所以我们就绝不应该不认同少数民族的文化、历史与文学，无论是历史文本还是历史事实。中国文化是多民族一体的，这是在正统的历史——《二十五史》上早已有定论的。汉族文学史不认同少数民族文学，这个问题如果不得到应有的重视，不加以反省的话，会带来严峻的民族问题。因为错误地把少数民族文化与文学排除在中华文化体系之外，所以导致少数民族也不愿意单向地向汉族文化传统靠拢。古语云“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如果汉族与少数民族双方都不认可对方的文化和自己的文化是在一体的中华文化下的“单元”，那么谈论“多元一体”、“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继承”等就是一句空话。

需要指出的是，这种不认同绝不仅仅是学术理论建设的问题。近年来在西藏、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屡屡抬头的分裂主义、恐怖主义和极端宗教思想，对我们的国家统一和人民群众的安全生活带来了严峻的挑战。我们不能仅仅从安全策略与行政管理的角度思考这个问题，还应该更多地从“文化之心”的角度来看。如果我们民族与民族之间文化相互不认同，那么无论管理手段多么先进，投入多少人力物力，都不能做到真正的民族团结。只有推进民族文化认同，才是治本之道，才能从文化上维护中国各民族文化“多元一体”这个历史以来固有的观念与事实。

2005年，笔者之一曾经在《民族文学研究》2005年第3期发表拙文《三重话语霸权下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认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处于西方话语、汉族话语、精英话语三重霸权压迫之下，我们有必要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现状，加强多民族文学研究，倡导中国多民族文化认同，倡导多元一体，恢复历史原貌，形成多民族文化互补互融，促进民族文学生态的正常化，进一步发挥多民族文学杂交优势，迎来中国文学之新生”^①。8年过去了，这“三重话语霸权”依然存在着。所以，我们必须正视汉族与少数民族文化上相互还不认同的现实，并运用“文化多元一体”的方法论来努力改变这种现状。

结 语

我们中国文化是一个“多元一体”的系统，在文化人类学的意义上，我们也主张“多元文化共和”的模式，而不是“一体四方”的模式。因为中国的文化与传统，从来不仅仅是也不应该仅仅是某个时代的文化、某个地域的文化或者某个民族的文化，而是一个从时间上、地理上和民族上多元共和的

^① 曹顺庆：《三重话语霸权下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民族文学研究》，2005年第3期。

现实。“多元”是指各个时代、各个地区和各个民族都平等地享有维护自身文化传统并参与到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文化交流过程的权利；“共和”是指这种文化交流必须既承认中华文化是统一的文化、中华民族是统一的民族这个立场，又坚持各民族各地区平等地看待其他文化的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文化霸权主义。最后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古人无法开口说话，所以我们必须用科学、严谨和尊重传统的态度，对中国古代文化进行审视、继承和发扬，维护我国多民族一体的传统文化遗产。

作者简介：

曹顺庆，中华多民族文化遗产与文化凝聚协同创新中心教授，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秦岭，四川农业大学文法学院讲师，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

现代中国的多元历史

——从辛亥百年看多民族共同体的文化兼容*

徐新建

〔摘要〕 本文关注现代中国的族群和文化多样性，通过对两组不同时代“诏书”和“盟誓”案例的分析，阐述了作为多民族共同体的现代中国自帝国解体以来的社会转变。文章强调只有透过多元的历史画卷，方可全面理解现代中国的既往进程和未来演变。

〔关键词〕 中国 文化多样性 诏书 盟誓

在沿边发现历史，从多元读懂中国。

——题记

现代中国以广博的地缘、多样的生态和悠久的历史为基础，结成了内涵多元的族群和文化共同体。以百年来的重大转型来观察，中国经历了从帝国解体向现代国家转变的根本演变。这过程的政治开端可从宣统三年，也就是如今常说的辛亥之年算起，到如今已满百年。本文从文化多样性视角出发，从这一过程中挑选出两组边缘事例——“诏书”和“盟誓”作为话题来作分析，意在说明现代中国多元遗产的由来和历史特征。

诏书一：大清解体

在当下汉语世界的流行观念里，“辛亥革命”是表述现代中国的重要词语之一。它的基本含义是这一年以革命的方式推翻帝制的清朝王朝，从此结束千古沿袭的封建传统，为建立现代的民族国家开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多民族文学的共同发展研究”（11&ZD123）的阶段性成果。文章曾在第11届人类学高级论坛上宣读，此处有所修改。

创了新的历史纪元。然而，面对清廷最后的诏书等史料，上述这些固定看法还可再作讨论。

农历的辛亥年就是公元的1911年，而以当时的官方用语来说，则是清“宣统三年”。这一年载入史册的大事不少，现在的论述多以公历的月份来记时。其中常被提及的主要有：

一月，英兵2000人进犯云南西部的片马地区。

二月，章太炎等在日本东京重组“光复会”。

四月，广州起义事败，72名革命党人葬于黄花岗。

五月，清廷组建“责任内阁”，因成员多为清朝皇族而被称为“皇族内阁”。

六月，宋教仁等在上海成立“同盟会中部总会”；同月，外蒙古脱离清帝国，成立“大蒙古国”。

九月，“各省都督代表联合会”在上海召开。

十月，武昌起义爆发，革命党人占领武昌；湖广总督瑞澂逃离武汉；汉川宣布独立，起义军打出“兴汉灭满”大旗；清政府派陆军大臣荫昌和海军大臣萨镇冰等前往镇压；同月，云南新军起事成功，蔡锷就任“大汉军政府云南都督”。

十一月，清廷诏命迅订议院法、选举法，任命袁世凯为总理大臣。

十二月，载沣辞去监国摄政王职位，解散“皇族内阁”，并下《罪己诏》；袁世凯派唐绍仪为全权代表南下，抵上海英租界与革命党议和；此时，原清帝国统治的内地18省中已有湖北、湖南及江西、广东和四川、云南等共13省宣布独立（自治）。

上述“大事记”的记载里，出场的历史角色至少有5个方面：清廷、革命党、地方（内地18省）及蒙、藏地区和洋人。如今流行的叙事以革命党为主体，每每削弱甚至去除了其他各方。因此只有恢复完整背景，才可能理解清廷的最后诏书。

辛亥年间清廷颁布过好几部内容不同的诏书。先是《罪己诏》，然后是《退位诏书》。二者的时间，以农历计算，一个是辛亥年（宣统三年）的十一月十一日，一个是同年的十二月二十五日；若以西元计算，则分别在1911年的12月30日和1912年2月12日。不过依照后者的表述则使原本相连的王朝时间看上去又隔了一个年头。

《罪己诏》由溥仪的父亲，时任监国摄政王的载沣代皇帝发布，宣称对时

局的动乱和民众的疾苦承担责任。时隔一月，随着局势的变化，清廷便又由隆裕皇太后以皇帝名义向天下颁发《退位诏书》，宣告移交政权，承认共和立宪政体。其曰：

朕钦奉隆裕皇太后懿旨：

前因民军起事，各省响应，九夏沸腾，生灵涂炭。特命袁世凯遣员与民军代表讨论大局，议开国会、公决政体。两月以来，尚无确实办法。南北睽隔，彼此相持。商辍于涂，士露于野。徒以国体一日不决，故民生一日不安……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特飭内阁与民军商酌优待皇室各条件，以期和平解决。……^①

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内閣總理大臣袁世凱
 署外務大臣胡惟德
 民政部大臣趙秉鈞
 署度支部大臣趙秉鈞
 署學部大臣唐景崇
 陸軍部大臣王士珍
 海軍部大臣譚學衡
 司法部大臣沈家本
 署農工商部大臣梁士詒
 署郵傳部大臣梁士詒
 理藩部大臣達壽

傳旨皇太后懿旨前因民軍起事各省響應九夏沸騰
 生靈塗炭特命袁世凱遣員與民軍代表討論大局
 議開國會公決政體兩月以來尚無確實辦法
 南北睽隔彼此相持商輟於途士露於野
 徒以國體一日不決故民生一日不安今全國人民心理多傾向共和
 而中各處既隔絕於前北方諸將亦先後於獲人心所繫天命可知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榮拂兆民之好惡
 是用外觀大勢內審輿情特率皇帝將統治權公諸全國定為共和立憲國體
 近經海內藏龍望治之心連綿不絕天下為公之義震世前經資政院選舉為總理大臣袁世凱之聲望有南北統一之方即由袁世凱以全權組織臨時共和政府與民軍協商統一辦法繼期人民安堵海宇大定仍令滿漢蒙回藏各族完全領土為一大中華民國予與皇太后得以退位後優游歲月長安國民之建復視見邦治之幸福且不創微歎此

图一 清廷《退位诏书》，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自此，清廷便以和平告示的方式宣布皇帝退位，把政权移交给了新兴的共和政府。不过为了体现皇室主动让位及善后待遇的保障，诏书阐明皇帝“但卸政权，不废尊号”，同时强调获取权力后的“大中华民国”应是“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的新国家。由此可见，就当时的实际情形而论，辛亥变故应视为大清解体和让位，而非简单地被革命推翻。史料表明，即便那时的主要参与者如孙中山等人，对辛亥之事最初也并不都称“革命”，而叫做“武昌首义”、“辛亥之役”或“民国光复”等。如孙中山就说过：“武汉首义，十数行省先后独立。所谓独立，对于清廷为脱离，对于各省为联合。”^②本文采用传统和中性一点的提法，称作“鼎革”，意在同时体现朝野上下的双

① 此《退位诏书》的简体字全文可参见《晚霞》，2007年第8期，第47页。

② 参见《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第2页、第17~18页。另见冯天瑜：《“辛亥武昌首义”名辩》，《江汉论坛》，2011年第4期，第5~8页。

向作用,并认为只有从这样的视角出发,才能重新关注那个时期此起彼伏的地方独立及响应甚广的联省自治,并深刻理解后来为何会接连出现帝制复辟,以及距辛亥20多年后以爱新觉罗·溥仪为首的满洲重建。依照冯天瑜的观点,“辛亥首义及其演进与终局,是革命党人与立宪派、从清朝离析出来的汉官、袁世凯集团、清廷满洲亲贵、西方列强等几种力量相互博弈的产物”^①。这说法是有道理的。

盟誓一：民国共和

辛亥之后,清朝让位民国,天下缩为国家,华夷关联的东亚局势大变。1931年“9·18”事变后,中国的东三省被日本关东军逐步占领。1936年的“西安事变”促使国共等力量广泛联合,组成了全面的抗日阵营。这样的变故不仅冲击南京、延安和重庆等不同政治集团所在的大本营,而且波及多民族共同体的边陲地区,比如云南边疆的佤族山寨。作为预兆和铺垫,在辛亥年间的云南,已先期出现过驻滇新军的率部起义,结果是宣布脱离清廷的“大汉军政府”之诞生及首领蔡锷之就任半独立新职“云南都督”。此后,经过中央与地方的数次较量整合,国民党政权终于同彝族出生的龙云、卢汉等控制的“滇系”势力建立了上下并置、夷汉共存的互补关系。

1943年4月,在国民政府特派官员杨钟岳和地方精英张万美等的召集下,卡瓦山17头目在班洪“歃血盟誓”,成立联防协会,立志在中央政府领导下联合起来,共同抗日,口号是:“协同一致,抗敌御侮。”《盟誓书》用汉文和傣文撰写,起款是“大中华民国云南省接缅甸边区卡瓦山十七头目联防协会”。

当时中国的全面抗战已进入关键时期。卡瓦山的《盟誓书》陈述说,危机已如“火在燃眉”,中央政府不忍边民罹此祸患,特派专员前来领导和组织联防。于是才有特派员等主盟下,17头目盟誓效忠:联防保卫边疆,维护领土主权完整。

盟书以“我们卡瓦”自称,强调中央此举所秉持的精神是“夷汉一家亲兄弟”,因此在英、日外敌的入侵面前有必要团结一致共同联防。作为有中央政府指导背景的誓盟,盟书规定了彼此的义务和权限,如头目们要“援助国军抗战,供应国军粮秣”;政府和军队“不许扰民,不许掠夺人民之财产”以及“不侵犯各头目原有之主权”,“建设实业改善人民生活”,等等。最后头目

^① 参见冯天瑜:《“辛亥武昌首义”名辩》,《江汉论坛》,2011年第4期,第5~8页。

们“各本良心对天发誓”：如有违反，愿遭天惩。^①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在云南边境的此种举措并非偶然，而实与中华民国自创建以来在对待夷汉关系上的认知、调整和演变相关。



图二 卡瓦《盟誓书》^②

大体而论，从早期同盟会主张“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到孙中山承认“五族共和”，再到后来蒋介石宣扬“中华同源”，国民政府处理现代多民族国家民族问题的策略是不断变动的。到了抗战期间，由于一致对外的需要，再对云南边疆的各族头目强调“夷汉一家”，便进一步体现出中央的灵活变通及“边疆少数民族”的有效回应。

“共和”一词，出自西方，是欧美体制在近代中国的转写和挪用。以一百年的过程来看，中华民国倡导“共和”的历史意义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超越早期同盟会主张“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种族立场，通过倡导多民族合作而得以继续拥有并经营帝国的领土和族群遗产；再就是引进西方，主要是美式的共和观念，通过民主政治使帝制王朝迈向现代国家。1947年在云南边疆以盟誓方式面世的“卡瓦盟书”便可视为此种经营的有效呈现。它同时表明：（1）国家的力量不但促进了汉人与夷人、中央与地方的联合，而且增强了对“多民族共同体”的认同及对外敌的区分和抵抗；（2）作为正迈入世界性“民族—国家”体系的主权政府，民国政权直接背靠的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阵

① 有关卡瓦山盟誓的论述可参见鲁国华等编：《碑魂：民族团结碑史料专辑》，2000年，思内图（2000）第2号，以及张海珍：《从三次割牛盟誓看普洱多民族关系的发展》，《思茅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0年第5期。

② 图片来源：笔者2011年摄于普洱民族团结碑纪念馆。

营。这后面一点使民国政府与借助日本而死灰复燃的“满洲国”及依靠共产国际而创建成长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形成区分和对立。

诏书二：“康德纪元”

20 世纪 30 年代初，在国共联合的全面抗战爆发前，因辛亥鼎革而解体的五族关联又发生了新的变化。退位后在天津“闲居”多年的爱新觉罗·溥仪于 1931 年出逃沈阳；1934 年，又在日本扶持下恢复帝位，变国号，改纪元，称“康德皇帝”。而在此之前，这位清廷的末代皇帝已在张勋等帝国旧臣的拥戴下，经历了从退隐到复辟，再从君主到遗民的起落变故。



图三 《康德诏书》展示件^①

这一年，爱新觉罗·溥仪在沈阳发布了改变纪元为“康德”的诏书。诏书的开篇沿用惯常体例，以帝王口吻写道：“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下面的内容是向世人宣告“满洲”建国，国号由“清”变“满”，同时宣布年号由大同（三年）改为康德（元年），而且“凡统治纲要，成立约章，一如其旧……”云云。

所谓“一如其旧”，指的是在帝制和满洲为主的根基上与“大清”相同。“康德”年号的取意，被认为是康熙和德宗（光绪）的缩称合并，意在表达续承大清基业之愿。这样，虽说连接二者的皇帝是一个，都是爱新觉罗·溥仪，

^① 图片来源：2011 年 5 月笔者摄于天津静园展览馆。